

海外学者论浦东开发开放

中央编译出版社

**《海外学者论浦东开发开放》
编辑委员会**

**顾 问：韦建桦
周禹鹏
尹承东**

**主 编：俞可平 田赛男
副主编：王吉林 薛晓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学者论浦东开发开放/俞可平 田赛男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海外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ISBN 7-80109-572-3

I. 海…

II. 俞…

III. 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概况—上海市

IV. F1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2349 号

海外学者论浦东开发开放 俞可平 田赛男 主编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h t t p: //www.cctp.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10 工厂

开 本:88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86 千字

印 张:12.75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海外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丛书》总序

——应当重视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研究

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们创造了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 9% 的奇迹,1999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改革开放前的 1978 年的 20 多倍。这一辉煌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强者而受到了世人前所未有的注意,使得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关注我国的改革开放及其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论著,其研究的视角也在过去 20 年间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汉学研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转换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从研究的重点来看,近 20 年海外学者的研究逐渐从中国历史转变到了中国的现实。研究重点从历史到现实的转变,是传统汉学研究发展到现在的主要表现。过去,海外学者对我国的研究统称汉学(Sinology),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那种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中国的历史和语言、文化传统。而 80 年代以来,研究的重点则日益转向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汉学研究显然不能包含上述转变的意义,代之而起的是

“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过去海外一些著名的研究我国的机构和学者几乎都与研究我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有关。像美国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研究所,德国汉堡大学的汉学系和慕尼黑大学的汉学研究所,荷兰莱登大学的汉学研究院等世界上著名的研究机构都以研究我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著称;而最近 20 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当代中国的专门机构相继崛起,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和德国汉堡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等,而且即使那些过去的汉学研究机构,现在也日益加重其研究当代中国的比重。

过去一代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几乎清一色都是汉学权威,如美国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许华茨(Benjamin Schwartz)、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德国的傅欧伯(Herbert Frank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法国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都以研究我国的历史和传统语言文化见长;而最近 20 年中产生的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多半都以研究当代问题而成名成家,如美国的何汉理(Harry Harding)、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cFarquar)、德里克(Arif Dirlik)、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拉迪(Nicholas R. Lardy)、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欧迈格(Michel C. Oksenberg),德国的海贝勒(Thomas Herberer)、波奈特(Armin Bonnet),英国的赛奇(Tony Saich)、戈登·怀特(Gordon White)等。20 年前海外研究我国的著名刊物当首推美国的《近代中国》和荷兰的《通报》,而现在反映当代中国研究成果的英国的《中国季刊》已经后来居上。澳

大利亚的《汉学研究通讯》则干脆改成了《中国研究》。

从研究的领域来看,20年间海外对我国的研究逐渐从历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人文学科,转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后者成为这20年间海外研究中国的热门学科。从发表的成果看,传统的文史哲方面的论著虽然仍占很大的比例,但这些年来关于我国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日益增多,这些发表的论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文史哲。从研究者来看,这20年中脱颖而出的著名中国问题研究权威中,多半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如何汉理、弗里德曼、麦克法夸尔、海贝勒、赛奇、怀特等是政治学家,拉迪、波奈特、青木昌彦等都是经济学家,路易·亨肯是法学家。学科重点的转换与海外有关中国研究的基金会的资助方针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些年几个较大的基金会资助有关中国研究的课题来看,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课题的资助,无论从项目的数量还是从资金的额度上看都明显超过了文史哲课题。事实上,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之一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主要资助对象就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从研究主体看,海外中国学者已经从单纯的国别专家,发展成为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群体;从单纯的学者,成为政府对华政策的顾问。以往的海外汉学家大体上都是比较单纯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是国别专家;但近20年来,除了国别专家以外,一些一般的学者,如一般的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例如,世界著名的反腐败研究权威琼斯敦(Michael Johnston)根本不懂汉语,但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反腐败问题有普遍的学术研究价值,所以也涉足了对我国反腐败问题的研究。以往的汉学家除了做纯粹的学问外,基本上

不涉足现实政治,与政府政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成为该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顾问或智囊人物,在国会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上,他们的意见往往举足轻重,更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直接应邀就任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如美国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中国事务帮办的谢淑丽女士就是一位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1993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使她一举成名,为民主党政府所瞩目。海外中国学研究主体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近年来定居海外的华侨学者正在海外中国研究中起着日益重要的、甚至是不可取代的作用。他们拥有不少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例如母语是汉语,非常熟悉国内情况,在中国国内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络,等等。他们或是与国外学者合作,或是单独进行研究,在海外中国研究的许多领域中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研究的意义来看,近20年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区域研究的范畴,而开始成为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过去,海外汉学研究是一个范围相当狭小的区域研究圈子,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局限于圈内学者阅读,而在近20年中这种情况大大地改变了。上面说过,中国研究已经不是国别专家的事,而是引起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的广泛关注,甚至其中的一些学者连起码的汉语常识也没有。以前,海外的中国学者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学汉学系或亚洲及中国研究机构,而现在则几乎分布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著名大学的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历史学系几乎都有中国问题专家。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也远远不只发表在专门的中国研究刊物上,而几乎在所有重要的社会科学刊物上都或多或少有所反映。例如,分别在美国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最有

影响的《美国经济学评论》和《美国政治学评论》上,近年来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文章,这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在《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费加罗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当代历史》、《经济学家》、《比较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和《社会科学杂志》等有世界影响的报刊上,关于中国研究的文章和报道更是屡见不鲜。

对于海外学者研究我国的上述视角的转换,以及围绕这一视角转换而发表的各种观点和理论,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应当把分析和鉴别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研究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首先,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意义。我国的改革开放既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顺应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潮流;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世界,另一方面又必然对世界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如此。我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近 $1/5$,解决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使全人类 $1/5$ 变得富强起来,这本身就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是全人类的一个壮举。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巨大成功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客观上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还将对类似我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强提供借鉴经验。简言之,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仅对我国的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意义,对世界历史进程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其实也是对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一种探索。

其次,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研究,既含

有偏见和浅见,也不乏真知灼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去除其中的偏见和糟粕,汲取其中的灼见和精华,听听海外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分析、评论、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不仅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意义,克服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使我们以更加宽阔的视野走向世界,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第三,了解海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各种观点,有利于知己知彼,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制订科学的对外政策服务。海外研究中国的著名专家学者常常是其所在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顾问,他们的研究通常成为其政府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例如美国的斯卡拉宾诺、何汉理和谢淑丽等。分析和研究这些海外中国专家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各种观点和主张,可以从更深的层次了解其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

第四,增强我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坚定对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信念。常言道,旁观者清。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但2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任何正直和公正的海外学者都不会否认。及时地介绍他们对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积极评价和分析,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五,宣传改革开放,树立中国形象。通过学术交流,运用学术语言和学术对话,使海外中国学者全面客观地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并通过他们向其所在国人民客观介绍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可以起到特别的作用。因为这些学者多数是严肃认真的,只要在了解他们的学术话语和观点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说理,往往能接受正确的观点。然后,他们又能以中国

研究专家的身份在国内发表观点,其影响力和说服力就特别大。

第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可以起到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的时期,正是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从两极向多极转变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在这样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无限生命力的最好明证。另一方面,许多海外学者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走向资本主义,这种观点甚至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影响。这表明了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曲解和无知,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缺乏了解。事实上,我们所做的一切与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通过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放到国际的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就可以明确地表明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本质,从而更加有力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无穷生命力。

最后,重视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是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开放的,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应当持开放的心态。听听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评论,就是这种心态的自然要求。

正是出于上述这些原因,我们编选出版了这套“海外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希望为党政干部和学者提供一些海外人士研究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材料。尽管我们力图完整地、全面地反映海外学者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各种观点,但限于编选者的水平,难免挂一漏万,敬希读者见谅。

书中收录的海外学者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各种观点,不论正确与否,仅代表其本人的看法,敬请读者注意辨析。

更高 更快 更好

——海外学者论浦东开发开放

俞可平

历史经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近代以来两大最发达的经济区——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现代化的两次高潮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

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终于艰难地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位于南海的广东得风气之先。作为珠江三角洲核心的广州更引领中国现代化的风骚,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一直是中国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即使在五口通商以后的最初几年,广州仍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中心。据统计,从当时对外贸易中占最大份额的中英贸易看,在整个 19 世纪 40 年代,由广州输往英国的货值,高居五口之首,在五个通商口岸进出口总值中的比例,高达 91.7%(1846 年),最低也在 75% 以上(1848 年)。

但是,从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心却逐渐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向长江三角洲的上海转移。广州曾经是中国最早的也曾是惟一的通商口岸,但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海关却诞生于 1854 年的上海,上海关的进出口贸易额也迅速赶上并超过了广州。以当时主要出口产品茶叶为例,在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广州口岸的茶叶出口量为 7600 万磅,而上海只有 380 万磅;而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上海口岸茶叶的出口量已超过广州、福州两口岸之和的 30%。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上海口岸的进出口总额已达到 3600 多万磅,差不多是广州的 4 倍。^①到了 20 世纪上半叶,上海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远东经济和金融中心。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上海一度是远东最大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1860 年到 1930 年期间,上海平均控制着中国出口总量的 68%。1933 年,上海的贸易量达到世界总贸易量的 1%。”^②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标志着中国新一轮现代化高潮的到来。无独有偶,珠江三角洲再度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最初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中,广东占了三个。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桥头堡”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场”的深圳更是一马当先,从改革开放前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边陲小县,发展成了举世闻名的现代化都市。市区常住人口从 1979 年的 3 万余人,猛增到 1999 年的 405 万人,20 年中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31.2%,实际利用外资 200 多亿美元。20 年间进出口额年均递增 42%,1999 年深圳市的进出口总额达到 504.28 亿美元,占全国比重的 14.5%,连续 7 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的榜首。珠江三角洲再度站在中国现代化浪潮的浪尖上,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和贸易中心。

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作为长江三角洲心脏的上海再度开始展现其作为远东经济和贸易中心的雄心和实力。两位德国学者根据 90 年代后上海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金融和服务业作用的迅速提升以及

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等事实，十分肯定地指出：上海正在成为“地区和国际经济中心”^③。

当然，历史的相似决不会是简单的重复。撇开上述两次现代化浪潮的基本政治和经济背景的根本差别不说，带动中国两大最发达的经济区走向新一轮现代化的龙头已不再是昔日的广州和“十里洋场”的上海，而分别是中国的两颗经济新星——深圳和浦东。

浦东新区位于黄浦江以东、长江口以西，是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一块三角形地区，紧靠基础雄厚的上海老市区，背倚物阜人丰的长江三角洲，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浦东新区面积533.44平方公里，2000年末户籍人口164.87万人。1990年4月18日，中央正式宣布建立浦东经济特区。与深圳、厦门、汕头和珠海四个经济特区相比，浦东开发得最晚，但规模最大，起点也最高。与其他特区不同，人们习惯上不称浦东为特区，而称为“浦东新区”。按一位旅美学者的说法，“在中文意思当中，‘浦东’就是黄浦江的东岸，‘浦’就是黄浦江，‘东’就是东面。‘浦西’，即上海的中心，表示黄浦江的西面。所以，浦东和目前的上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上海很重要的一部分。由于这两个原因，这个区域被称作‘浦东新开发区’或者‘浦东新区’，而不是‘经济特区’或经济技术开发区。”^④

开发浦东，以此为龙头再造上海作为远东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中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内容。1989年6月16日在北京的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不久，邓小平就提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在1990年初，邓小平又提出：“比如抓

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1年初,邓小平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他心目中的战略目标:“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要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重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地位,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浦东的开发则是关键的棋子。邓小平的这一构想,清楚地反映在他不无遗憾地所说的那段话中:“回过头来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⑤所以,浦东开发是邓小平现代化发展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浦东开发虽然晚于其他经济特区,但起点高,优势十分明显。

首先是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一位海外学者这样来描述浦东的地理优势:它由黄浦江的东岸、长江入海口的西南岸、川杨河的北岸构成,这片地域是一个等腰三角形:顶角是黄浦江和长江的汇合处,左底角由黄浦江和川杨河汇合而成,右底角是川杨河和长江的汇合处;这片地域的绝大部分在上海市中心 15 公里的辐射范围之内,人口 110 万(1989 年);面积 350 平方公里,和目前上海整个城市中心地区的面积一样大。后来,整个开发区的面积扩大到 522 平方公里。环绕黄浦江和长江入海口的水域,水深超过了 12 米,浦东可以发展海河运输。与此同时,覆盖数

百平方公里的那片陆地,也有巨大的潜力发展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所以,浦东被许多世界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建筑师视为 20 世纪世界大都市中最后的一片“极品之地”^⑥。

其次是它所依托的上海所具有的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人才基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一直在工业、科学、技术和贸易等方面起着领导者的作用。人口仅有全国 1%、面积只有全国 0.1% 的上海,承担了国家财政收入的 10%,最高时达到 1/6。上海还是世界十大港口之一,年吞吐量占全国总吞吐量的 1/3 以上,其出口产值占全国总出口额的 1/7 多。上海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基地,它拥有 50 所大学,1600 多个研究机构,1/8 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集中上海。^⑦

再次是特别优惠的政策。中央对每一个经济特区都给予了特殊的优惠政策,而给浦东新区的政策则比其他特区都更加优惠。这些特殊的优惠政策来自几个方面,即中央政府、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上海市政府。这些特殊政策有些是其他特区也享有的,相当一部分是浦东所特有的。特别是,中央政府答应给浦东的基础设施提供直接的财政和信贷配额,这是其他所有特区都未曾享有的。

中央政府在 1990 年初同意给浦东 10 项优惠政策,其要点是:1)对外资企业,其所得税与特区相同(15%);2)对开发区内外资生产所用的设备和原材料,免交关税和工商统一税;3)鼓励外资企业在开发区投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给这些外资在其开始盈利起 5 年内免交所得税,其后 5 年减免 50%;4)允许兴办第三产业,准许外国银行开设支行;5)外商在浦东保税区的转口贸易,免除其原材料和产品的关税,对其人员的出入境提供便

利,并允许其进行仓储贸易;6)实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使用权最长为 50—70 年,外商可承包土地进行开发。^⑧

1990 年 9 月,上海市政府又宣布了开发浦东的 9 项新规定。1992 年 3 月中央政府同意给上海和浦东 10 项比深圳更加优惠的新政策。其中前 5 项是授权上海市政府审批投资项目的权力,即授权上海:1)在外高桥地区建立中资或外资仓储贸易企业的审批权;2)在浦东新区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出口审批权;3)在浦东新区建立非工业项目的审批权;4)新区内投资金额低于 2 亿元的工业项目的审批权;5)发行股票和债券用于浦东开发,并允许其他地方的股票在上海进行交易。后 5 项政策是给上海扩大基金以支持浦东开发的权力:1)允许上海每年发行 5 亿元的工业债券;2)除了配额外,允许上海向上浮动 1 亿元的股票价值;3)除已经获得每年 1 亿美元的贷款外,中央政府同意给上海每年 2 亿美元的低息贷款;4)允许上海为外商投资者每年向上浮动 1 亿美元的 B 股价值;5)1992 年,在原有 2 亿元规模的基础上再增加 1 亿元的附加分配基金。

最后是良好的综合开发环境。除了税收、信贷、配额、进出口等特别的优惠政策外,浦东开发的另一个明显优势,是其优越的综合投资环境。海外学者普遍认为:“浦东引进了许多大胆的改革措施,创造了一个优良的投资环境。这些措施包括发展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重新构建分配体系;改善立法结构;建立一个更加精简有效的管理机构以协助经济体系向市场化方向转型。”^⑨在综合投资环境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浦东新区进行政府体制的创新,改善其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提倡“一门式”服务。所谓“一门式服务”,即外资企业或国内非财政投资项目注册的全过程都在一幢办公楼里完成,新区